

※文哲論壇※

童書業及其《左傳》研究

張博成*

一、前言

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疑古學派對於近代學術產生莫大的影響，這個學派的核心理論主要是顧頡剛所提出的「累層說」，爲了使這個理論更加圓滿，身爲顧氏副手的童書業更提出「分化說」以補充其理論。他們的疑古學風，曾在當時學界掀起一股風潮。

前人於童書業的學術成就研究甚少，而對其《左傳》研究也鮮有論及。就目前個人所知，惟有顧頡剛的〈春秋左傳研究序〉與張志哲的〈《春秋左傳研究》和童書業教授〉兩篇文章^①；而張氏所作，又與顧〈序〉內容大致雷同，因此能資參考者有限。筆者在顧先生的基礎上，再直接閱讀童書業有關《左傳》研究的著作，從這些資料中尋繹一些線索，對童書業研究《左傳》的成果做一初步的探究。

本文首先介紹童書業的生平、著作，次及童氏對於經史研究所採取的態度與方法，而後將其《左傳》學研究分爲《左傳》的自身問題與以史學角度研究的《春秋左傳研究》兩個方面敘述，以闡明童氏《左傳》研究之梗概。

* 張博成，本所約聘研究助理。

① 〈春秋左傳研究序〉見童書業撰：《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卷前，頁1-6。〈《春秋左傳研究》與童書業教授〉則見於《讀書》（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11月），第11期，頁119-122。

二、童書業的生平、著作^②

童書業，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章卷益，浙江寧波人，是近代知名的史學家。在古史傳說、西周史、春秋史及繪畫史、瓷器史的研究上，均有其重要的地位。

童氏祖籍浙江鄞縣，清末移居安徽樅陽。宣統元年(1908)五月二十六日，童書業出生於浙江寧波。幼年所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時，從曾在前清任官的祖父讀《詩經》，十五歲時，已從私塾老師完成十三經及其他塾課，如《過庭筆記》(童氏家訓)、《綱鑒易知錄》、《古文筆法百篇》、《唐詩三百首》、《古詩源》等。課餘之外，更廣泛涉獵先秦諸子、中外史書和詩詞畫帖。童書業學習能力及記憶力極強，凡讀過之古人典籍，大多能背誦如流。黃永年即指出：

古書除《公羊》、《穀梁》、《周禮》、《孝經》和《易知錄》只是點閱外，所讀過的都能夠背誦。^③

這對於他日後在古史的研究工作上，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一九二四年，童書業到上海，在父親的會計師事務所內當練習生。一九二五年，進入教會所辦的聖舫濟英文專修學校，學習英文。由於當時他所感興趣的是學詩作畫，於是先後從繆谷瑛、王季歡等人學習繪畫，並曾在王季歡主編的《鼎衡畫報》上發表過有關繪畫的論文。爾後，又經由王氏的介紹，跟隨北京的胡佩衡學習山水畫，在胡氏的細心指導下，他的繪畫技巧因而大有精進。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間，童書業在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擔任書記官。這段時間，他遍讀了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陳獨秀、顧頡剛、郭沫若等人的

^② 童氏生平主要參考其長婿黃永年：〈童書業傳略〉，《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輯，頁329-337；〈記童書業先生〉，《學林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6月)，第6集，頁1-17；〈童書業〉，《中國史學家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頁397-400。及童氏的學生徐鴻修：〈童書業〉，《中國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7月)，1980年第7期，頁22-25；〈童書業〉，《中國歷史學年鑑198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頁390-392。

^③ 見黃永年：〈童書業傳略〉，《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1輯，頁329。

著作，其中又以顧頡剛的《古史辨》第一冊最令其印象深刻。這使得他的思想擺脫舊式的束縛，而轉向新文化、新事物的思維方式，從此他選定研治古史作為個人的畢生職志。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童書業失業在家。在這段期間，他致力於古史的研究。一九三一年，撰《禮記考》；一九三三年，撰《虞書疏證》。一九三四年，經由王季歡的介紹，到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的校印所當校對員，後來又在惠興女子中學任代課老師。在赴任杭州之前，曾將所著《虞書疏證》稿本寄給顧頡剛，並在《浙江圖書館館刊》發表〈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一文，對於顧頡剛《尚書研究講義》中的史料問題，提出了若干訂正的意見，因而獲得顧頡剛的賞識。同年夏天，顧頡剛因母喪返回杭州，與童書業會面，並邀請他擔任自己的研究助手。一九三五年夏，童書業依約前往北京，擔任顧頡剛的助理。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九月的這段期間，他與顧頡剛合作發表多篇古史論文，並擔任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講授春秋史課程的助教，更撰寫了幾十萬字的春秋史講義。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兼任由顧頡剛創辦的禹貢學會編輯，主編《禹貢》半月刊「古代地理專號」，在《禹貢》發表〈說驩兜所放之崇山〉，懷疑崇山即今之嵩山，表現出其歷史地理研究的高度見識。在研究古史傳說之餘，童書業還致力於繪畫史的研究，撰寫《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偽》、《中古繪畫史》。他根據可靠的文獻史料，探索畫風的演變及唐朝以後畫史觀念的演變歷程，訂正了繪畫史中某些影響很大的訛傳。因此，黃永年認為，童氏開創了「較為科學的中國繪畫史」^④。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顧頡剛遠去大後方，禹貢學會也隨之風消雲散。童書業因有家累，暫時返回老家安慶。次年轉赴上海，經呂思勉推薦，擔任上海光華大學中國歷史地理課程的講師。此後他先後任職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師、江蘇東臺文化中學校董、宜興張渚鎮念劬中學教員、常州橫林鎮惠林中學教員。一九四一年，他依照顧頡剛的囑託，負責完成《古史辨》第七冊的編輯工作。

抗戰勝利後，童氏擔任上海博物館歷史部、總務部主任。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八月這段期間，他撰寫了數十萬字關於古代神話傳說、歷史地理、美術史等方面的學術論文，並且利用在博物館工作的機會，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瓷器史研究。他在瓷器史研究中的某些考證結論，大都已被考古學界證實。

^④ 見黃永年：〈記童書業先生〉，《學林漫錄》，第6集，頁8。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童書業經由楊向奎的推薦，擔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爾後更出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第一、二屆青島市人民代表及山東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等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童氏即參加「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先後發表多篇論文；他根據馬列主義的觀點，就中國和世界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許多跟隨潮流的見解。隨後，他又積極參與世界古代史及中國古代各類專史的研究，撰成《古代東方史綱要》、《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等專著和專題論文多篇。此外，更整理完成舊作《唐宋繪畫叢談》、《中國瓷器史論叢》（與史學通合著）、《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等。一九六五年，童書業因舊疾復發而在家休養，在養病期間，他仍孜孜不倦地從事著述，終於完成了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即終結其一生先秦史考證研究成果的力作——《春秋左傳研究》。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歲。

童書業代表性的著作，在單篇論文方面，較著名者有與顧頡剛合著的〈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墨氏姓氏辨〉、〈夏史三論〉等，獨立撰作者有：〈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丹朱與驩兜〉、〈三皇考序〉、〈有仍國考〉等。在專著方面，其重要之美術論著，收入於《童書業美術論集》；經史論著，則有：《禮記考》、《虞書疏證》、《春秋史》、《中國疆域沿革略》、《春秋王都辨疑》、《漢以前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古代東方史綱要》、《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及《春秋左傳研究》等。

三、童書業對於經史研究所採取的態度及方法

清朝末葉，康有為發表《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開啓了近代中國「疑古」的學風。民國建立之後，這股風潮更在西方科學思想發展的推波助瀾之下，進展得十分迅速，「古史辨」學派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應運而生的。

古史辨學派的核心理論是顧頡剛所提出的「累層說」，而童書業雖繼承這個觀念，但覺得尚有需要補充的地方，於是他提出「分化演變說」來補充。他說：

春秋以前歷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到了春秋戰國間，禹之上又出來

了堯、舜，這堯、舜便是上帝的分化演變，並不是隨意假造的。到了戰國時，堯、舜之上又出來了黃帝、顓頊、帝嚳等人，這些人又都是堯、舜等的分化演變，也並不是隨意偽造的。到了戰國末年，五帝之上又出來了三皇，這三皇的傳說又都是黃帝等上帝傳說和哲理中的名詞的演變分化，也並不是完全偽造的，大約演化出現愈後的人物，他們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這便產生「累層地造成」的現象。所以有了分化說，「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真實性便越發顯著。分化說是累層說的因，累層說則是分化說的果！^⑤

童書業認為有了「分化說」的補充，分化與累層的因果關係即可明白清楚，而使得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真實性，便能夠越發顯著。經由他們的鼓吹，當時的人都認為古代史有極多的問題，也知道古代史並非完全是事實，而有一部分是神話；甚至更有人撰作中國通史時，不敢提及古史的隻字片語^⑥。

這種情形，引起某些學者的反對。一九三五年，章太炎發表〈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一文，即針對當時的疑古風氣而發，他說：

經史傳世，江河不廢。歷代材智之士，籀讀有得；施之於用而見功效者，不勝縷指，然以考信自矜則寡，蓋經除今文，史除雜史而外，率皆實錄。^⑦

章氏認為扣除今文經及雜史的部分，只要是經書、史書所載之事，率皆實錄。而實錄者，乃「事之最可信者」^⑧，不容後人置喙、懷疑。因此，對於以考信自矜之疑古學者，章氏罵道：

吾國妄人，不加深思，震於異說，貿然從之。嗚呼！國家未亡，而歷史亡，可哀也已。^⑨

又說：

開發較遲之國人，不願居中國後，不信堯、禹，尚無足怪；獨怪神明之後，史籍昭彰，反棄置不信，自甘與開化落後之異族同儕，迷其本末，數典忘祖，信

⑤ 見童書業：《古史辨·自序二》，《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8月），第7冊，頁6。

⑥ 同前註，頁1。

⑦ 見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4卷4期（1935年8月），頁1。

⑧ 同前註。

⑨ 同註⑦，頁3。

可哀已！^⑩

由「吾國妄人」、「迷其本末」、「數典忘祖」等字眼看來，章氏對於當時的疑古學風，可說是深惡痛絕。而對於疑古史學家求諸器物的考證方法，章氏以為此乃「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⑪。他認為中國史冊明白，不必採用器物考證的迂道^⑫，並以重要的器物如鐘鼎、貨幣、碑版，偽造者既多，不能據之以訂史，他說：

以史乘證器物則可，以器物疑史乘則不可。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如據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⑬

章氏認為器物只能作為研究古史的輔助工具，倘若捨棄清楚明白的史冊不用，而以輔助性質的器物來作為訂史的媒介，章氏以為絕對不可。

面對章太炎的申斥，身為「古史辨」學派中堅人物之一的童書業，作出回應。他針對章氏所言「經史率皆實錄」的說法，舉出章氏口中「實錄」的矛盾之處兩條，藉以駁斥章氏之論，他說：

其實即經史自相矛盾之處，已不知幾許，姑舉二例，如〈呂刑〉謂「伯夷降典，析民維刑」，〈堯典〉則謂伯夷典禮；信〈呂刑〉必不得信〈堯典〉，信〈堯典〉必不得信〈呂刑〉，安得謂兩皆實錄哉？《國語》謂夏人祀杼，不謂夏人祀少康；《左傳》則謂少康有中興夏室之大功；《國語》謂一姓不再興（叔向語），《左傳》則謂夏祀中絕，王子夷於隸庶而復興；信《國語》必不得信《左傳》，信《左傳》必不得信《國語》，又豈得謂兩皆實錄哉？（關於少康事，辨見〈夏史五論〉）又《周禮》謂周公時疆域一萬萬方里，此亦豈可據為實錄邪！^⑭

童氏認為若果如章氏所言「經史皆實錄」，則其自相矛盾之處將作何解釋？必是一真一假，或是兩者皆假，絕無兩造皆真之事。因此，經史率皆實錄的論點，是很難成立的。此外，對於章氏所謂「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的器物之學，童氏說：

^⑩ 同註⑦，頁4。

^⑪ 同註⑦，頁5。

^⑫ 章太炎說：「凡荒僻小國，素無史冊，歐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靈於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尋此迂道哉？」引自同註⑦。

^⑬ 同註⑦，頁6。

^⑭ 見童書業：〈童丕繩先生致編者書〉，《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5期（1935年10月），頁2-3。

案近人辨證金文至精，其信者必十分之九；太炎先生泥於《說文》之偽古學，不惜學康長素之舌；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太炎先生此文論金文處最謬，有識者一望即知，茲不多辨。）^⑮

他認為當時學者考訂金文的成果豐碩，可信度極高，為何要棄置而不用？何必只拘泥於《說文解字》呢？他更以不值一辯，表達不能苟同的堅定立場。

童書業既認為經史並非完全是實錄，而是由於「累層說」和「分化說」所造成的史實失真，所以應該懷疑。然而童書業強調，他們的疑古絕不是像一般古人的疑古，他認為古人的疑古，是懷抱孤憤的，是「好詆古人以取快哉」，是「有所為而疑」的；相反地，他們的疑古是「無所為而疑」的^⑯，是為學術真理而疑的，這便是「古史辨」學派的學術精神。具備了這種精神態度之後，他認為要以「先之，勞之」和「無倦」的精神^⑰，蒐集真偽夾雜的經典史籍、既多且雜的舊器古物；再用「先之，勞之」和「無倦」的精神，鑑別這些史料，將因累層說與分化說遮蓋的部分，一件件地剔除，一層層地剝落，以還給古史本來的真實面貌，這便是童書業對於經史研究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

四、童書業對於《左傳》的研究

童書業研究《左傳》的成果可分為兩方面來談：第一、《左傳》的自身問題，第二、以史學角度研究的《春秋左傳研究》，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左傳》的自身問題

《左傳》的本身問題極多，而童書業對其名稱、作者及其與《國語》、《公羊傳》、《穀梁傳》的關係與比較，均有所論及，茲分述如下：

1. 《左傳》的名稱問題

關於《左傳》的名稱，歷來說法不一，而童書業在這個問題上，他接受劉逢祿

^⑮ 同註⑭，頁3。

^⑯ 同註⑭，頁2。

^⑰ 《古史辨·自序二》，頁1。

的說法，劉氏說：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⑱

童氏認為劉氏所言極是，以為《左傳》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其原名當為《左氏春秋》^⑲。不過，對於這樣的說法，當時的學者如錢玄同並不以為然，他說：

《左氏春秋》之名正與《公羊春秋》、《魯詩》、《毛詩》是同樣的意義。故說《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還是上了劉歆的當。^⑳

錢氏謂《左傳》是等同於《公羊春秋》、《魯詩》及《毛詩》的，故當名為《春秋左氏傳》。錢氏之所以如此說，乃因他認為《史記》關於《左氏春秋》的記載，皆為劉歆所偽竄的。

對於《史記》有劉歆偽竄之跡的說法，童書業提出兩點加以反駁：一、以《新序·雜事五》有「《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一語為證；二、以汲冢所獲書全同《左氏》為證。前者與《左傳》僖公二年的傳文略同，以《新序》為劉向所修之古書，是《左傳》在劉歆以前已名《春秋》之證。後者則以《晉書·束皙傳》中所載的汲冢獲書事為例，佐以與《史通》諸篇對於此事的記載與看法為證，認為《左傳》原名《春秋》^㉑。合前、後二證觀之，則劉歆偽竄《史記》之說，乃可杜矣。

除了駁斥劉歆偽竄《史記》的說法外，童書業也針對錢氏「《左氏春秋》之名正與《公羊春秋》、《魯詩》、《毛詩》是同樣的意義」的說法，作了一番辨證，他說：

業按《史記》所謂《左氏春秋》殊不與《公羊春秋》、《魯詩》、《毛詩》等同義，《左氏春秋》可以云左丘明作，《公羊春秋》、《魯詩》、《毛詩》其可謂公羊高、申公、毛亨、毛萇作乎？蓋《左氏春秋》之所謂《春秋》，史之

⑱ 見〔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9月《皇清經解春秋類彙編》影印刊本），第2冊，頁1453。

⑲ 見童書業：〈《國語》與《左傳》後案〉，《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1期（1935年2月），頁12。

⑳ 見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古史辨》，第5冊上編，頁2。

㉑ 見童書業：〈《國語》與《左傳》後案〉，《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1期，頁14。

別名也；而《公羊春秋》、《魯詩》、《毛詩》則猶言《春秋》公羊氏學、《詩》魯學、《詩》毛氏學，或公羊氏之《春秋》、魯申公之《詩》、毛氏之《詩經》也。兩名不同，錢先生混而一之，誤矣。^②

由上述可知，在童書業的認知裏，《左氏春秋》是史的一種別名，屬於「史」的範疇；而《公羊春秋》、《魯詩》與《毛詩》則屬於「經」的範疇，二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因此，他認為錢氏將兩者混為一談，豈不大誤。

順著童氏的理路而下，吾人可以這樣理解這個問題：在內容上《公羊春秋》、《魯詩》、《毛詩》本是一種附屬於「經」底下的傳記之學，依附經書而生，不可單獨成立；而在形式上，它採取「訓詁通大義」的解經模式。《左氏春秋》則與前者大不相類，在內容上，它是一部可以單獨成立的史書，本非為解經之用；在形式上，它所採取的是一種「敘述史事」的體裁。在內容、形式均不相同的情況下，要以「傳」的角度去看待《左氏春秋》，在童書業看來，是不可行的。既然《左氏》是史，而「春秋」是古代對於史書的一種別稱，因此童書業認為以《左氏春秋》為名，比之以《左傳》為名來得恰當。

2. 《左傳》的作者

《左傳》的作者，相傳為魯君子左丘明，然而自中唐以來，由於疑經的風氣日熾，使得此一說法受到了質疑，例如以《春秋》名家的啖助學派就曾說：

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若邱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③

趙匡認為孔子稱譽他人時，皆指其以前之賢者，而左丘明正是其中的一位。若以丘明為才實過人之賢者，必不會落到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的批評。因

^② 同註^①，頁13。

^③ 見〔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第五》，《經苑》（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第5冊，卷1，頁10。

此，他認為《左傳》的作者應為孔門後之門人，而非左丘明。

時至晚清，今文學者莫不疑古文經為偽作，而把作偽的矛頭指向劉歆。例如前述的錢玄同即以《左氏春秋》與《公羊春秋》、《魯詩》、《毛傳》意義等同，認為若相信古文家的說法以《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則是上了劉歆的當。上什麼當呢？上了劉歆作偽的當。關於劉歆作偽的動機，康有為則有看似相當完備的說法，他說：

漢世《春秋》之學最盛，歆思自樹一學，校書得左氏《國語》，以為可借之釋經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則天下士難欺，故託之古文，此歆以古文偽經之始也。既已偽《左傳》矣，必思徵驗乃能見信，於是遍偽群經矣。^{②④}

又說：

以《公》、《穀》多虛言，可以實事奪之，人必聽實事而不聽虛言也，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為《左氏傳》；作《左氏傳微》以為書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託之古文以黜今學，託之河間、張蒼、賈誼、張敞名臣通學以張其名，亂之《史記》以實其書，改為十二篇以新其目，變改「紀子帛」、「君氏卒」諸文以易其說，續為經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偽群經以證其說。事理繁博，文辭豐美，凡《公》、《穀》釋經之義，彼則有之，至其敘事繁博則《公》、《穀》所無。遭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②⑤}

康氏的說法，意指劉歆作偽的原始動機只是欲立新說，而自成一家之學。由於漢朝以《春秋》學為最盛，遂以《左傳》為作偽之濫觴，爾後適逢王莽篡漢，劉歆偽《左傳》之不足，更潤色點篡而遍偽群經，以求媚於王莽，使天下貴尊其書其學。

對於今文學者的說法，童書業不以為然，他認為若如康氏所言，則劉歆在當時今文經群儒憤攻古文經之時，為何能「不露其偽跡，欺給一二千年而無一人發其覆」，而提出「是何天下之易欺也」的反問^{②⑥}。因此，他認為《左傳》是劉歆所偽

^{②④} 見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偽》（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3月），頁147。

^{②⑤} 《新學偽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偽上》，頁84-85。

^{②⑥} 見童書業：〈劉歆冤詞〉，《古史辨》，第7冊上編，頁407。

的說法，根本是個錯誤。

爾後，童書業重新檢視《左傳》中的資料，撰寫〈《春秋左傳》作者推測〉一文。在這一篇文章中，童氏一則透過《左傳》中所表現的生產技術、生產關係、階級鬥爭、政治制度、文化型態等觀察，推測作者當離春秋之世不遠；二則就作者學識觀點的反映，推測作者當為稍微帶有早期法家思想的儒家後學，且似乎長於兵家之學；三則以《左傳》記魯事較詳而可信，於列國則揚晉、楚而抑齊、秦，且張大楚國之事甚多，推測作者應與晉、楚兩國有關，且與楚國之關係尤為密切；最後，他又以《左傳》中的預言，大多應驗於春秋末年至戰國前期的這段期間，推測《左傳》當在戰國前期已大致寫定。據此四端，童書業以為姚鼐在〈春秋補注序〉中「《左傳》為吳起之徒為之者蓋尤多」的說法近是²⁷。他又以此說法與古書中有關吳起的記載相互對照，而提出《左傳》蓋「吳起及其先師後學陸續寫定，惟吳起之功多耳」的看法²⁸。此外，在〈春秋左傳考證後記〉中，童氏亦根據上述幾個重要證據，驗證姚鼐〈春秋補注序〉與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的說法，也是持《左傳》為吳起及其後學所作的看法²⁹。

3. 《左傳》與《國語》的關係

《左傳》與《國語》二書，相傳均為左丘明一人所作，二者互為表裏，故有「春秋內外傳」之稱。到了清末，康有為指斥《左傳》為劉歆根據《國語》所偽，而錢玄同更發皇其說，提出《左傳》與《國語》是彼詳則此略，此詳則彼略之說，謂二者本為一書所改作³⁰。

一九三五年二月，童書業在《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發表〈《國語》與《左

²⁷ 有關此四點的詳細情形，見童書業：〈《春秋左傳》作者推測〉，《春秋左傳研究》，頁351-352。

²⁸ 童書業以《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韓非子·說林上》及《說苑·建本》中有關吳起的記載，對照自己的四項推測，認為姚鼐的說法比較接近事實。但是他以《左傳》文體前後不一，而古代史書多非成於一人之手，因此推測《左傳》為吳起及其先師後學陸續寫定。參見〈《春秋左傳》作者推測〉，《春秋左傳研究》，頁352。

²⁹ 見童書業：〈春秋左傳考證後記〉，《春秋左傳研究》，頁285-289。

³⁰ 錢氏所謂「此詳則彼略，彼詳則此略」的說法一共有八點，詳見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重印新學偽經考序〉，《新學偽經考》，頁428-429。

傳》後案〉一文。在該篇文章中，童氏列舉古史說之矛盾、紀事之重複、紀事之衝突、文法之不同及文體之不類等五個證據，說明《左傳》與《國語》並非一書所改作的^{③①}。

此外，在兩部書孰先孰後的問題上，童書業也有所論及。他列舉兩書四個記載相同的事件，比較其異文。例如「有神降於莘」一節（《左傳》在魯莊公三十二年，《國語》在〈周語上〉），在這一段記載中，《國語》於「國之將興」以下凡一百九十一字，而《左傳》則以簡短的三十九字概括，因此童氏說：

（《左傳》）盡去敷衍支蔓之詞，文字遂大改觀；若《國語》在《左傳》之後，有良範在前，其文何致退化至此？^{③②}

又如「長勺之役」一節（《左傳》在魯莊公十年，《國語》在〈魯語上〉），童書業認為《國語》於此事的記載是「文雖繁而義甚寡」，而《左傳》則「文簡，而《國語》之義已包含其中，豈非文字之進步哉」^{③③}！認為以《左傳》在文字的敘述上較《國語》為簡鍊，呈現文學的進步性。又這項舉證正和其兩書非一書改作的兩個證據：「紀事之重複」與「文體之不類」相符，這不僅可說明兩者非一書，而且也可以說明《國語》成立當在《左傳》之前。

4. 《春秋》三傳的優劣

③① 這五個證據是：1. 古史說的矛盾：童書業根據《國語》的〈晉語〉、〈魯語〉所載，排列出少典之後而同時有黃、炎二帝，而二帝之後又有顓頊的古史系統；又據《左傳》昭公十七年所載，列舉出黃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顓頊為序的古史系統，二者明顯不同，是其矛盾之處。2. 紀事之重複：童氏以孫海波在〈《國語》真偽考〉謂《國語》紀事重出於《左傳》者六十餘事，且另尋孫氏未及者十二條，認為兩者紀事雖同，然以《史記》多用史冊舊文之《左傳》，而不用異辭瑣語之《國語》，認為兩者並非一書。3. 紀事之衝突：童書業舉《國語》與《左傳》記載衝突「顯而易檢者」十事，以說明倘若二書為一書改作，則不可能有記載衝突的情況發生。4. 文法之不同：童書業採用瑞典學者高本漢〈《左傳》真偽考〉的說法，認為兩者文法相近，惟有一事相違，即凡作「像」解者，《左傳》全用「如」字，而《國語》則兼用「如若」，因此兩書不能是一人所作。5. 文體之不類：童氏認為《國語》文辭支蔓而直率，而《左傳》則簡潔而委婉。兩者文體大異其趣。見〈《國語》與《左傳》後案〉，《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1期，頁5-8。

③② 同註③①，頁11。

③③ 同前註。

《春秋》三傳孰為優劣，歷來有所爭論，在漢代即有數次關於三傳的論爭^{③④}。而在宋代，《春秋》學典範之作——胡安國的《春秋傳》也曾就三傳的優劣作過比較，說：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

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③⑤}

由上述可知，胡氏肯定三傳各有其價值，三者不可偏廢，因而他主張：

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③⑥}

他認為研究《春秋》，當採《左氏》之事，《公羊》、《穀梁》之義。換言之，《左氏》之義不如《公羊》、《穀梁》，而《公羊》、《穀梁》之事不如《左氏》，三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缺，唯有各取其長，才能在《春秋》的研究上得到圓滿的答案。

在孰優孰劣這個問題上，童書業曾就《春秋》三傳中，四十條經、傳同事異文的記載相互比較，撰成〈《春秋》經、傳考異〉一文。經童書業的比勘，他極度不信任《公羊》與《穀梁》兩傳：

(1)《公羊》之說為漢師之見，非春秋以上人之觀念。《穀梁》之說，更為迂儒所為，直不知春秋史事者之陋言矣。^{③⑦}

(2)《公》、《穀》之說皆戰國秦漢間婦女守貞已被重視之觀念也。……而《公》、《穀》觀念晚出，即可知矣。^{③⑧}

^{③④} 漢代共有五次關於三傳的論爭：第一次為董仲舒所代表的《公羊》學與瑕丘江公的《穀梁》學，結果江公啞於口，不如仲舒，卒用《公羊春秋》。第二次為西漢哀帝時，劉歆與太常博士爭立《左氏春秋》。第三次為東漢光武帝時，陳元與范升討論《左氏春秋》之立於學官。第四次為東漢章帝時，賈逵與李育的爭辯。最後一次為以《公羊》學保衛者自任的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攻擊《左氏》及《穀梁》二傳，而鄭玄則作《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以應之，使何休有「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之嘆。

^{③⑤} 見〔宋〕胡安國：〈序傳授〉，《春秋胡氏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卷首，頁3。

^{③⑥} 同前註，頁3-4。

^{③⑦} 見《春秋》隱公元年，「冬十有月，祭伯來」條案語，引自童書業：〈《春秋》經、傳考異〉，《春秋左傳研究》，頁275。

^{③⑧} 《春秋左傳研究》，頁281。

(3)《公羊》譏世卿之說，非原始儒家義。^{③⑨}

童氏指斥《公羊》、《穀梁》的「迂」、「陋」，兩傳觀念多為晚出，其所釋之經義，並非原始儒家之義。由於不相信《公羊》、《穀梁》兩傳，童氏甚至在《春秋》經文的選用，選擇了《左傳》的經文^{④⑩}。至於對《左傳》的評價，童氏則認為《左傳》較《公羊》、《穀梁》先出，所載為早期儒家之觀念^{④⑪}，而為文簡括，較《公羊》、《穀梁》為長且可信^{④⑫}。

由於童書業極度重視《左傳》的史料，對於《左傳》有「無經之傳」、「有經無傳」及「經傳互異」的情形，大致都採取信任的態度，他說：

(1)《左氏》所載入情入理，當有史料依據。^{④⑬}

(2)《經》蓋有脫文。《公》、《穀》兩傳於此均曲為之說，惟《左氏》無文，蓋其慎也。^{④⑭}

(3)《左傳》較《經》多宋一國，度是時形勢，頗有可能。^{④⑮}

童書業認為《左傳》的記載不是出於無端杜撰，而是有舊的史料作為依據，他更以上述情形來懷疑經文有所脫漏^{④⑯}。

《左傳》豐富的史料文獻，取得了童書業極大的認同，因此他不採納《公羊》、

③⑨ 見《春秋》隱公元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76。

④⑩ 在《〈春秋〉經、傳考異》中，凡是有引用經文處，必定用《左傳》的經文。又如在襄公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條，童書業認為《公羊》、《穀梁》作「閏」乃假借字，他以出土的邾公綏編鐘與《左氏》相合為證，認為《左氏》經文有本，非出於杜撰，反而較二傳可信，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82。

④⑪ 童氏說：「《左傳》所載為春秋戰國間早期儒家之觀念，故為先出。」見《春秋》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83。

④⑫ 童氏說：「《左傳》文甚簡括，較《公》、《穀》為長。」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案語，《春秋左傳研究》，頁 272。又說「《左氏》之說明白可據，自屬可信」，見《春秋》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83。

④⑬ 見《春秋》莊公元年，「冬，齊仲孫來」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77。

④⑭ 見《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78。

④⑮ 見《春秋》桓公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76。

④⑯ 在《左傳》隱公元年有兩處無經之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與「有蜚，不為災，亦不書」，童氏於此下了案語：「此處《左氏》又有無經之傳二條，疑《魯春秋》原有之也。」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 274。

《穀梁》迂曲附會的「義」，而接受了《左傳》有所依據的「事」。他不是利用《左傳》的事來解經，因為他認為「《左傳》為史而非經」^{④7}，它不是解經之資，而是可供中國上古史研究的。爾後，他那一部以史學角度研究的絕響——《春秋左傳研究》，就是遵循著這個看法而醞釀出來的產物。

（二）以史學角度研究的《春秋左傳研究》

《春秋左傳研究》是童書業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總結其一生先秦史研究的精華，以下謹就這部書的寫作動機、成書經過、內容及特點，作一粗淺的敘述。

1. 《春秋左傳研究》的寫作動機及成書經過

《春秋左傳研究》是童書業最後的一部著作，它是由《春秋左傳考證》與《春秋左傳札記》匯集而成。關於這部著作的寫作動機，是由於一九四六年時，童書業受顧頡剛的囑託，將《春秋史》講義重新修訂，並且正式出版，以供古史研究之用。雖然這部著作展現了童書業深厚的史學涵養，然而在撰寫時顧及文字的流暢，在引用史料原文時，將原文改成白話，而融入在敘述之中。因此不熟悉古書的人，閱讀起來，往往不知其講述之依據。爲了彌補此缺憾，當時他原想另外撰寫一部《春秋考信錄》，以提供並考證春秋史事的史料。不過，這個夙願是由一九六六年寫成的《春秋左傳考證》加以擴大實現^{④8}。因此，這部書實是爲了彌補《春秋史》的缺憾而作的。

一九六五年童書業開始著手《春秋左傳考證》的工作，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完成，十二月改定。而《春秋左傳札記》則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以極短的時間寫出初稿。由於當時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加上童氏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於是他將潤飾《春秋左傳札記》字句的工作，交予他在西安的長婿黃永年完成。一九六八年年初，童氏因病逝世。

一九七三年，童書業的夫人將《春秋左傳考證》書稿寄予顧頡剛，隨後黃永年

^{④7} 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條案語，引自《春秋左傳研究》，頁284。

^{④8} 顧頡剛在〈春秋左傳研究序〉中言：「《考信錄》只考春秋部分，《考證》所及，則如〈後記〉中所說，『舉凡古史傳說、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經濟、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態之大概，皆大致完備，并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證』。」引自《春秋左傳研究》，卷前，頁3。

也將潤飾過後的《春秋左傳札記》原稿寄給顧氏。經由顧頡剛的引介，委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張志哲代為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將《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合為一書，並收錄童氏所撰寫的〈《春秋》經、傳考異〉、〈《春秋左傳》作者推測〉及〈周代諡法〉三篇，題名為《春秋左傳研究》，由顧頡剛作序，並請童氏的學生徐鴻修潤飾文字，最後於一九八〇年十月正式出版，距童氏之卒，已有十二年。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顧氏以八十五歲高齡逝世。

2. 《春秋左傳研究》的內容

《春秋左傳研究》是由《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結合而成的，然而在討論其內容時，則不得不分別敘述之，以下略述其梗概：

(1) 《春秋左傳考證》

《春秋左傳考證》凡二卷，第一卷為本書之「正錄」，它蒐羅童書業在一九六一年以前所做的先秦史考證。不過他以「問題所涉，為存真訂誤計，不能不獵及六一年以後之研究」⁴⁹，因此第一卷所收，「問題皆提出於六一年前，而內容則有涉及六一年後之研究者」⁵⁰。此卷的內容為考證先秦史料一百二十條，分別為「古史傳說之部」二十一條、「西周史之部」十三條、「春秋史之部」三十六條、「西周春秋制度文化之部」三十三條、「春秋地理之部」十七條，舉凡古史傳說、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經濟、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態之大概，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證，皆能顧及，童氏自認此卷「幾包括春秋歷史之全部」⁵¹。

第二卷為本書的「附編」。第一卷完成後童書業重新翻檢金文、《易經》、《尚書》、《詩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儀禮》、《周禮》、二戴《禮記》、《孝經》、《逸周書》、《戰國策》、《古本竹書紀年》、《世本》、《論語》、《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孫子》、《楚辭》、春秋戰國異辭等相關的先秦史料，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時值文化大革命將起，童氏不知此後史學方向如何，因此草草將一九六一年以後所發現

⁴⁹ 見童書業：〈春秋左傳考證後記〉，《春秋左傳研究》，頁 285。

⁵⁰ 同前註。

⁵¹ 同前註。

的新問題寫成第二卷。本卷的內容較第一卷簡略，僅十六條，萬餘言左右。

《春秋左傳考證》主要是以《左傳》的一段文字作為引子，而冠以標題，然後引用相關史料證明並闡述自己的觀點，茲舉第三十三條「西周之亡」為例：

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昭二十六年）

案：西周之亡，除由社會經濟之變化及政治之昏亂外，其他尚有重要之二因：一、對外作戰之失敗（《後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紀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史記·秦本紀》：「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左氏》昭四年：「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詩·召旻》：「今也日蹙國百里」，可見西周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二、天災之流行（地震飢荒等，「民卒流亡，我居圍卒荒」）。幽王之姜后蓋娶於西申者（《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平王奔西申」，非東遷邑謝之申？）及因廢姜后及太子而伐申，申、緡、西戎「會以伐周」，「遂殺幽王驪山下」，驪山蓋為西申所在地（《史記·秦本紀》：「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可證）。^{⑤2}

童書業在上面先引《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的一段記載，再以「案」字表達自身的觀點，認為西周之覆亡不是單純只有社會經濟變化及政治昏亂兩個原因而已，另外尚有對外作戰失敗、天災之流行兩個原因。他引用相關史料如《竹書紀年》、《史記》、《左傳》、《詩經》等，以證成自己的看法，此即《春秋左傳考證》撰作方式的大致情況。

(2)《春秋左傳札記》

一九六七年，童書業考慮到《春秋左傳考證》還可以更加簡略，因此在史料的選擇上，除金文考古材料外，只選用重要者如《易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論語》、《禮記》^{⑤3}；而在內容標舉上，則列舉典型者若干，餘者至多注明書名、篇卷，不列舉原文，例如在第二十四條「庶人、工、商」，童氏說：

襄九年傳：「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庶人」為隸屬

^{⑤2} 〈春秋左傳考證〉，《春秋左傳研究》，頁 39-40。

^{⑤3} 〈春秋左傳札記·說明〉第 2 條，《春秋左傳研究》，頁 290。

農民，「商」為官府商人，「工」為官府手工業者，皆低於貴族、高於奴隸之階級。「皂隸」為官府奴隸。〈晉語〉四（「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桓二年傳（「庶人、工、商，各有分類」）、哀二年傳（「庶人、工、商遂」注：「遂得進仕。」「人臣隸圉免」注：「去廝役。」）、襄十四年傳等文，均可證也（西周金文如《師毀毘》、《伊毘》「百工」與「僕馭」、「牧」、「臣妾」等並舉，地位似較低，但仍非奴隸）。

工商主要居於城中，隸屬官府而作業，生活尚不甚痛苦（商人尤其如此。《詩·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職」，商人之致富，即貴族亦以羨慕之）。庶人主要居於田野，西周金文在一部分庶人隨土地分賜（《大盂鼎》、《矢毘》等），觀《詩·七月》等篇之記載，農民受剝削、壓迫甚重，生活至為痛苦也。⁵⁴

此條主要討論農、工、商的生活情形。在此，童氏只列舉《左傳》桓公二年、襄公九年、哀公二年，《國語·晉語》與《詩·大雅·瞻卬》等可據為典型者外，其他如一些金文材料、《左傳》襄公十四年及《詩經·豳風·七月》則列出篇卷名，而不注出原文。其主要目的只是想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來，因此凡屬於常識性的資料，一概從略，於是另寫了《春秋左傳札記》。

《春秋左傳札記》亦分正、續兩編；正編是系統地考證古史傳說和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及制度、文化、地理等，計七十條，編末附錄〈《春秋左傳》作者推測〉一文。續編則是若干專題之考證，凡三十條，其後附錄〈周代諡法〉一文。

《春秋左傳札記》的體制大致和《春秋左傳考證》相似，只是在內容上以「簡明」為主，不以繁瑣考據為要，茲舉前面已引述的「西周之亡」為例，說明其間之差別：

昭二十六年傳：「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合觀《周詩·大雅》及〈鄭語〉等較可靠史料，西周之亡，蓋由於天災、人禍、戎狄交侵（《詩·召旻》：「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幽王又昏亂，信用讒婦、佞臣，內亂、外患并生，以致速亡。⁵⁵

以《札記》所述的「西周之亡」，對照《考證》所論的「西周之亡」，我們不難發

⁵⁴ 《春秋左傳研究》，頁 311-312。

⁵⁵ 《春秋左傳研究》，頁 302。

現：《札記》在史料的處理上，大抵只提及篇名而不及引言，取其重要者述之；在文字的敘述上，《札記》也較《考證》簡潔扼要甚多，確實做到了以「簡明」為主，不取繁瑣之考據。因此，顧頡剛說：

這《札記》和《考證》一簡一繁，各有所長。讀者可先看《札記》，得其概要，欲更求其詳，則再看《考證》。^{⑤⑥}

《考證》與《札記》二者互為表裏，相互資濟，合為一書，可謂宜哉！

3. 《春秋左傳研究》的特點

關於《春秋左傳研究》的特點，茲根據顧頡剛先生的看法以及個人愚見，歸納如下：

(1) 考證古史相當系統、全面

童氏認為無論《考證》或《札記》，均「保存太古傳說、西周春秋史事之完整體系」^{⑤⑦}。吾人翻檢《春秋左傳研究》，不難發現童氏所考證的問題，包含了古史傳說、西周史事、春秋史事、春秋制度文化及春秋地理各方面，涵蓋範圍相當地廣泛而全面，而他又將相同的問題匯集，並以時代先後為序，予以系統化的聯繫，有如類書一般，使讀者能就問題類目尋檢。顧頡剛認為這是一般考證性的著作極不容易做到的，他說：

考證著作通常只能考證某幾個方面，解決某一些問題，像丕繩教授這樣從古史傳說到春秋史事作出系統全面的考證過去還不曾有過。^{⑤⑧}

(2) 以精審謹慎的態度考證史料

一九四七年，童書業撰寫的《春秋史》問世時，當時呂思勉給予這部書的評價說：

考索之精，去取之慎，蓋未有逾于此書者。^{⑤⑨}

^{⑤⑥} 《春秋左傳研究》，卷前，頁4。

^{⑤⑦} 見童書業：〈春秋左傳札記例言〉，《春秋左傳研究》，頁291。

^{⑤⑧} 《春秋左傳研究》，卷前，頁4。

^{⑤⑨} 見呂思勉：〈春秋史序〉，《春秋史》（上海：開明書店，1947年4月），頁2。

從呂氏的評語，可見童氏考證古史的審慎態度，而《春秋左傳研究》更是尤有過之。吾人從童氏〈春秋左傳考證後記〉中所提及，其所蒐羅的材料，除金文考古材料外，更涵蓋先秦時代的經、史、子、集等重要史料文獻。這些史料既多且雜，必須以「先之、勞之」和「無倦」的精神去蒐集；再用「先之、勞之」和「無倦」的精神，將這些精粗不一，真偽夾雜的史料，相互對照檢驗，去蕪存菁，力求審慎精核，以還給古史一個真實的原貌。因此顧頡剛認為呂氏「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的評語，完全可以移贈至《春秋左傳研究》上⁶⁰。

(3)分析史事，必敘其始末，使讀者能因小而見大

《春秋左傳研究》在討論一個議題時，並非全部如「西周之亡」那樣制式地羅列史料，只為證明「至於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的亡國情形；而是在某些議題上，他會根據該項議題的本身延伸下去，使讀者能夠掌握更多的訊息，例如《春秋左傳考證》的第三十五條「鄭莊小霸」及第三十六條「所謂齊僖小霸」⁶¹。前者為童氏引用《左傳》「鄭伯克段于鄆」的傳文作楔子，除了分析該事件的發展外，更引而申之，歷敘鄭國在春秋時代的重要史事，直到戰國時期滅亡為止；其間有童氏精闢的形勢分析，更旁及至鄭國的軍事、社會、經濟等周邊資訊，使讀者從「鄭伯克段于鄆」這個單一事件，擴及到其他層面，進而觀察整個鄭國的發展簡史。後者則以《左傳》桓公十一年，「齊、衛、鄭、宋盟于惡曹」之事為始，歷敘並分析其間的朝聘、征伐、盟會等大事，直到齊僖公為魯、鄭、紀聯軍所敗，小霸之局告終為止。

由這兩個例子來看，利用一個單純的史學命題，使讀者清楚掌握一個事件的始末，而擴及至其他層面，這是《春秋左傳研究》的另一特點。

五、結 語

從上文的敘述，可歸納下列數點：

⁶⁰ 《春秋左傳研究·序》，頁4。

⁶¹ 「鄭莊小霸」見《春秋左傳研究》，頁41-42；「所謂齊僖小霸」見《春秋左傳研究》，頁44。

其一、童書業雖是古史辨學派的中堅人物之一，然其學歷並不高顯，只唸過幾年家塾，連中學都沒有正式上過，其學術成就，皆是由「先之、勞之」和「無倦」的精神而來。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考證古史，以「無倦」的精神去蒐集資料，亦以「無倦」的精神去檢閱資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無所爲而爲」的態度，去疑其所當疑，信其所當信，以還給古史一個原來的面貌。童氏的《左傳》研究，也是採取這種觀點，重新檢閱《左傳》。

其二、其《左傳》學研究可分爲兩個層面來看：第一、透過《左傳》本身的某些問題以檢視若干經學史上的問題，例如《左傳》的原名爲《左氏春秋》；《左傳》的作者爲吳起及其後學弟子；《左傳》與《國語》非一書所改作，而《國語》成立在《左傳》之前；《左傳》乃三傳中之佼佼者。第二、以《左傳》豐富的文獻資料來研究中國的上古史，而作一全面而系統的探討。

其三、《春秋左傳研究》乃童氏後期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深爲顧頡剛所稱許。它呈現了童氏系統、全面的古史考證，精審的治學態度，以及清楚明白的史事分析，反映出其一生豐碩的古史研究學養。

就總的來說，童書業的《左傳》研究並不是純粹的經學研究，而是偏向利用經書重新檢討中國上古史事，而這種研究的方法，正是古史辨學派的研究特徵。